

耶穌會士艾儒略 與明末士大夫交遊新證

張先清*

明末入華意大利籍耶穌會士艾儒略是天主教傳入福建的關鍵人物。他在福建傳教二十餘年時間裡，積極貫徹利瑪竇知識傳教的策略，通過與福建士大夫展開廣泛交遊，吸引福建知識界對天主教的認同。近年來筆者從一些稀見明人詩文集中查閱到一些有關明末福建士大夫與艾儒略交往的新史料，現擇其要者予以披露，以期有助於學界進一步深入探討艾儒略在福建的傳教與文化活動。

引言

意大利籍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 是明末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於1609年受命來華，1610年抵達澳門，居留兩年，學習漢語。1613年，艾氏終於得以進入內地，輾轉於北京、上海、山西、杭州、常熟等地傳教。1624年，他追隨致仕歸里的葉向高來到福建，從此居留此地傳教，長達二十五年之久。在傳教八閩期間，艾儒略“共建大堂二十二座，小堂不計，受洗一萬餘人”⁽¹⁾，被譽為“開教福建之第一人”⁽²⁾。

作為利瑪竇適應策略的忠實執行者，艾儒略繼承和發揚了利瑪竇開創的補儒易佛傳教手法。在福建活動期間，他與閩中士大夫展開廣泛的交遊，不僅在文人圈中獲得了大量的追隨者，而且也贏得了“西來孔子”的雅號。針對艾儒略與福建士大夫的交遊問題，此前中外學者已進行了較多的研究，如林金水先生就曾依據《三山論學記》、《熙朝崇正集》、《口鐸日抄》等史料，

考證出與艾儒略有過交往的二百零九位福建士大夫，這是迄今為止有關艾儒略與福建士大夫交遊最為詳細的研究。⁽³⁾

1649年，艾儒略在福建延平府天主堂辭世後，追隨艾氏多年的門人李九功、沈從先、李嗣玄決意為其撰寫一篇行狀，以紀念這位闡教閩中的先驅。在這三位文人教徒所作的〈西海艾先生行略〉一文中，特別提到了艾儒略在明末福建文人界的重要影響：

若吾閩則張令公夏詹、柯侍御無譽、葉相國臺山、何司空匪我、蘇司徒石水、蔣相國八公、黃憲副友寰、孫學憲鳳林、銓部周公日臺、陳公祝皇。當道則前興泉道、今冢宰曾公二雲、前漳南道、今司徒朱公未孩，此數十公者，或誼篤金蘭，或橫經北面。其他青衿韋布皈依稱弟子者，奚啻數千人。⁽⁴⁾

從上引文可見，與艾儒略交往的明末福建士大夫，除了葉向高、何喬遠等數十位“或誼篤金

*張先清，現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人類學與民族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系主任。

蘭，或橫經北面”的名公巨卿外，“其他青衿韋布皈依稱弟子者”尚有數千人之多。由此可知，目前所考證出的二百餘人祇是艾儒略在福建活動二十五年間結交的一部分士人名錄，還有不少與艾儒略有過交遊的福建士大夫尚不為人所知。筆者近年在從事明清人文集天主教史料整理過程中，從一些稀見詩文集中查閱到了一些有關明末福建士大夫與艾儒略交往的新記錄，現擇其要者予以披露、闡釋，希望能對學界進一步深入探討艾儒略在明末福建的傳教與文化活動有所助益。

翁吉燭〈題泰西艾先生弟子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有一部孤本明人文集《石佛洞樞俚小品》，書署：“晉江翁吉燭裴郎著，田居中鶴汀選，吳載鰲大車參，田景和叔玫評，楊期演則龍閱，兄吉御龍郎訂，弟吉烜呂郎次。”該書為崇禎六年（1633）刻本，臺灣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該書影印本，筆者所見即為此影印本。全書共分十六卷，卷一為賦、騷；卷二為擬、考；卷三為論、表、策、議；卷四為傳、序、記、引、跋、題、擬書；卷五為述略、評、辯、原、說；卷六為解、問對、問答、紀語、言語、感悟、書事、紀、詰、嘲、喻；卷七為頌、疏、偈、讚、銘、碑、書後；卷八為品、文、辭、詞、歌、行；卷九為志、箋、狀、帖、札、史、經、譜、判；卷十為祭文、誄、哀辭、塔碣、志銘、志、行狀、雜說；卷十一為古樂府；卷十二為潤帙、苦帙；卷十三為丙帙、丁帙；卷十四為戊帙、己帙；卷十五為庚帙、辛帙；卷十六為壬帙、詩餘、詞餘、魔凡三弄。在該書卷四中收錄有一篇題為“題泰西艾先生弟子卷”的文字，全文如下：

天啓丙寅，泰西艾思及先生周行至泉郡，時與余相過從善，得悉天文地理之書。丁卯復見於福州，各出意義以相程。嗣後，余杜門雲山鎮眼海鏡，輒翻千佛名經，欲以微星子語

券。次聞艾先生久駐足於桃源。桃源故余祖父庠地也，恨宇塵紙俗，每繫余脚，不得侍艾先生遊。壬申春，復聞艾先生涉泉，私擬過訪，而蘇浙人有餉余以房稿者，督甚促，再復作跛驚態，鞭鬼上篋山，白雲明月，言不可去，遂已。頃先生弟子有持箋欲廉余疥者，余問艾先生安否？則曰：安。安則余喜。憶丙寅六月，先生過訪余齋，余出後園果子對酌。時苦旱卓午，余謂先生曰：今日必雨。先生曰：未也，炎天安得雨！余曰：江南最癖雨，名曰“漏天”，即炎天不過屋上瓦茅耳，久將壞。先生曰：嘻，有是哉！俄未舉箸而雷震，大霆從晴逢照齒間聞。先生於是始與余講《天主實義》甚悉。先是利先生與先君子善於北雍，而余得遇先生於梓地，余幸矣。所可畏者，塵封岔人，不使撤開耳罩耳。近聞先生欲往桃源，計夏間余當一行，若造先生教也。回顧前事，幾令垂睫而欲失云。遂題於左。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⁵⁾

本文作者翁吉燭，字裴郎，福建永春（別稱桃源）人。崇禎間貢生⁽⁶⁾，曾任瓊州府學教授。他在上引文中談及個人和艾儒略在泉州、福州等地的交往情況。當1625年艾儒略在福州初步站穩腳跟後，他就開始利用文人網絡展開廣泛的傳教活動。1626年春，艾儒略首次來到泉州。《勵修一鑒》中記載了艾氏的這次行程：“謝君懋明者，晉江庠生也。（……）天啓丙寅（即1626年，引者註）憩修荀江書齋。（……）是歲正月，大西艾先生來郡，謝君未知。（……）”⁽⁷⁾艾儒略1626年的首次泉州之行可說收穫很大，他利用這次訪泉結識了許多泉州士大夫，例如，明末泉州知名學者何喬遠就是在這一年和艾氏相識並結為莫逆之交的。何喬遠辭世後，艾儒略曾應其子之請，為其撰寫像贊，他在文中追述了自己初入泉州並與何喬遠相識的經過：

旅人抱事造物主之學，航舟西來，二十餘年於斯。丙寅歲入溫陵，得接先生一晤，

即成莫逆。既而贈詩贈序，數年往還，無厭也。⁽⁸⁾

艾儒略與泉州士大夫的交遊為他在當地開展傳教活動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這篇短文披露了不少反映艾儒略與福建士大夫交往的有趣信息——

其一，從引文可見，翁吉燭也是在艾儒略第一次來泉州時就和他初識，並時相過從。在文中，翁吉燭還提到他第一次從艾儒略那裡“得悉天文地理之書”。我們知道，早在1623年，艾儒略所編《萬國全圖》和《職方外紀》兩書已經在杭州刊刻出版，此處翁吉燭提到的天文地理書籍，極有可能即是指這兩部書。艾儒略此次在泉州似乎居住較久，因為依照翁吉燭的記載，在當年的一個炎熱夏天，艾儒略還造訪過翁吉燭的住處，並受到他的款待。也正是在這天下午，艾儒略詳細地向翁吉燭講解了《天主實義》一書的要旨。

其二，從現存史料可知，艾儒略1626年夏從泉州返回福州後，直到1629年冬，這三年多時間裡他基本都在福州地區傳教。而翁吉燭的記述也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佐證。因為翁氏提到他和艾儒略“丁卯（即1627年——引者註）復見於福州”，雙方還討論了天主教義。

其三，翁吉燭在文中提到艾儒略1632年以前曾經有一段時間“久駐於桃源”，這一點與其它中文史料的記載相符。據《口鐸日抄》記載，1631年“閏十一月，艾先生時在桃源，嚴子思參自清漳抵謁”⁽⁹⁾。這是艾儒略第三次來泉州，並與漳州教徒嚴贊化在永春相會。因為永春是其故鄉，翁吉燭很希望能夠跟隨艾儒略在當地居住一段時間，祇是因為文債所累，無法脫身。1632年春，艾儒略第四次來到泉州。翁吉燭也提到了艾氏的這次行踪：“壬申（即1632年——引者註）春，復聞艾先生涉泉”，他本來計劃前去拜訪，但又因為文債纏身，祇好作罷。艾儒略這次來泉州後，也順道於當年五月在門人顏爾宣的陪同下前往永春，

和黃賁宇、鄭思階等教徒相會：“越五年壬申，夏四月，艾先生再入桃源，顏爾宣從。（……）十一日，抵桃源，諸友畢會。”⁽¹⁰⁾

其四，翁吉燭在文中還提到“近聞先生欲往桃源”，他準備夏天的時候也前往永春和艾儒略相會、討教。依據《口鐸日抄》的記載，艾儒略在1634年4月間曾經抵達永春，和當地教徒姚則坤、陳景明、陳景耀等相會。⁽¹¹⁾此處翁吉燭所提，可能即指此次艾儒略永春之行。但可惜的是，由於史料缺乏，我們不知道兩人最終是否在永春見面。

其五，翁吉燭的文中還透露出一個研究艾儒略與明末福建士大夫交往的重要中文史料綫索。這篇文字的標題是“題泰西艾先生弟子卷”，按照翁吉燭的記述，他寫這篇文字的初衷是因為艾儒略的門人弟子持箋登門索文。我們知道，在明末文人界中，詩文唱和是交遊盛事之一，文人間通過贈詩贈文，不僅相互砥礪，而且也結下情誼。這種風氣影響很大，以致入華傳教士也不能免俗，甚至還加以利用，作為擴大天主教在文人界影響的一種手段。例如，明末天主教會就曾有意識地將士大夫題贈艾儒略等傳教士的詩文輯存，從而也為後世留下了《閩中諸公贈詩》這一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貴中文史料。翁吉燭此處提到的艾儒略門下弟子持箋索文一事，可能即與前述《閩中諸公贈詩》的做法實為異曲同工。也許艾儒略本人或者其門下弟子有意遍邀與艾氏有過比較密切交往的福建文人題箋，從而達到一種以文宣教的目的。假使這個推斷可以成立的話，那麼，我們完全有理由猜測，明末福建天主教會可能形成一種“閩中諸公贈文”之類的記述艾儒略與福建士大夫交往的中文史料，祇是不知這類文稿是否早已毀於兵燹蟲蠹，或者仍然存於天壤間，正等待今人的發掘。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翁吉燭的這篇文章還為我們考證利瑪竇與福建士大夫的交往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綫索。翁吉燭在文中提到，他的家族與明末來華傳教士實有兩代交情：“先是利先生與

先君子善於北雍，而余得遇先生於梓地，余幸矣。”引文中提到的利先生，很顯然是指明末著名的耶穌會士利瑪竇，而北雍則指北京國子監。也就是說，翁吉燾的父親曾經與利瑪竇在北京國子監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我們知道，利瑪竇在定居北京的十年間（1601-1610），曾經與中國士大夫們展開廣泛的交遊。1608年，他在一封致羅馬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件中就談到在北京與士大夫的這種交往盛況：

我們在北京的計劃全部如願以償了。京城裡的達官顯貴們都非常尊重我們，也常來我們的會院，十分客氣地拜訪我們。我們還在交通十分便利的地方買了一個很好的宅院。來拜訪我們的人也越來越多，以至於我幾乎每天都留在家裡接待來訪的賓客了。每隔三四天，我再出去回訪，非常疲憊。⁽¹²⁾

目前，有關利瑪竇與中國士大夫的交遊最為深入的研究當屬林金水先生。他依據中西文獻史料，已考證出一百四十餘位與利瑪竇有過交往的中國士人。⁽¹³⁾ 而我們注意到，翁吉燾的父親並不見於林先生的〈利瑪竇與中國士大夫交遊一覽表〉中。可以說，這是一條新的綫索。那麼，這位與利瑪竇交好的翁姓福建士大夫是誰呢？

在《石佛洞樞俚小品》中有一篇序文，署“癸酉夏日社弟劉鑿世起甫書於後築居”，其序曰：“裴郎為吾鄉名進士桃槎公郎，弱冠負奇名嘖嘖，走吳越，所交遊遍海內吳豪間。”由此可知，翁吉燾的父親是明代永春籍進士，號桃槎。乾隆《永春州志》卷之二十一〈選舉二·明進士〉記載萬曆三十八年（1610）韓敬榜有一位永春籍進士翁為樞⁽¹⁴⁾，此翁為樞正是翁吉燾之父，因為在花村看行侍者所著的《談往》中，記載了一則〈飛黃始末〉，其文云：

萬曆丁未進士福建翁為樞（號瑤槎），辛酉、壬戌間出守鎮江。伊子吉鼎，通材也；與

周介生、簡臣兄弟為年通家友。後吉鼎恩貢，授瓊州教授；日在瓊臺通惠泉聚談。彼與鄭之龍兒女至戚，言其膽智材略，非懦將債帥所窺一斑者。倘遇張江陵，必為再起之戚繼光；惜無人知之。⁽¹⁵⁾

在這則有關鄭芝龍的故事中，明確提到翁為樞和他的兒子翁吉燾。引文中翁為樞號“瑤槎”，可能是“桃槎”的誤記。明人陳際泰所撰《太乙山房文集》卷之九〈壽文〉中收有一篇〈翁桃槎先生六秩序〉；同樣，在明人張銓文集《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三〈駢牘〉中也錄有一篇〈答翁桃槎戶部〉，可知“桃槎”應為翁為樞的號。翁為樞，字紫璇，號桃槎。萬曆三十七年（1609）中舉，次年（1610）成進士，先後任蘇州府學教授、九江樞使、鎮江知府等職。⁽¹⁶⁾ 翁為樞可能正是在1610年赴京參加會試時和利瑪竇相識。這一年在北京拜訪利瑪竇的中國士人達到高潮，利瑪竇在日記中留下這樣的記載：

最緊張的莫過於1610年。這一年來訪人之多確實使我應接不暇，不知所措。不過，我還不至於無法應付。這一年從各地進京朝覲的官員達五千多人，又正好是會試的時間。這種考試祇能在北京舉行，每科取三百名進士，而進京應試的考生卻有五千之多，這兩件大事，大大增加了我的工作量，而且恰逢是基督教的大齋期，這給我帶來更大的困難。⁽¹⁷⁾

可以想象，1610這個大比之年，剛剛中舉的永春士子翁為樞滿懷“暮登天子堂”的憧憬，趕到京城參加人生中最為關鍵的一次考試。由於利瑪竇在士大夫圈子裡早已名聲遠揚，因此，某一天他也不能免俗地和其他舉子一起前去拜訪這位泰西奇人。此後利瑪竇也可能回訪了翁為樞，雙方在你來我往中結下了友誼。儘管隨着當年5月11日利瑪竇在京城遽然染病辭世，雙方的交往戛



然而止，但這段歷史卻被翁為樞的兒子翁吉燁記載在他的文集中，成為翁吉燁追憶父子兩代與利瑪竇、艾儒略這兩位明末最有影響的來華耶穌會士交遊的一段佳話。

陳鴻〈贈艾思及〉與〈題萬國全圖扇面〉

明末福州士人陳鴻，字叔度，一字軒伯，是閩中著名的詩人。曹學佺招入詩社。一日在曹家洪塘石倉園中社集時，陳鴻有“一山在水次，終日有泉聲”之句，曹學佺大加贊賞，“由是詩名大著”。陳鴻“不善治生，獨以詩為業”。他和徐火勃、曹學佺等相友善，一同活躍於晚明福州詩壇。徐火勃在為陳鴻詩文集作序時，就追憶了三人間的詩文之交：

適者曹能始主詩盟，少許可，亦雅量叔度，移叔度之居與鄰，謂其可與言詩。《秋室》一集，余與能始所選，不為不嚴，叔度無怨色也，猶謂其多謬，以余知詩，命為之序。⁽¹⁸⁾

丙戌（1646）之變，曹學佺自殺殉明，陳鴻年老不能自存，以貧病死。⁽¹⁹⁾

陳鴻與艾儒略有過交遊，在《閩中諸公贈詩》中收錄有其贈艾儒略五言詩一首：

客從遠方來，雲歷五春夏。
地既盡於茲，河漢已倒瀉。
其國敦敬天，衣冠佩王化。
艾君早慕道，每每著聲價。
若置碣石宮，談鋒倍驚訝。
利公乃齊名，腹笥何醞藉。
遺以數千言，讀之手常把。
始知滄溟外，日月異晝夜。
神仙信可登，弱水本堪跨。
泛海昔張騫，卻是尋常者。⁽²⁰⁾

在陳鴻詩文集《秋室編》中卷之二〈五言古詩〉中，也收錄了其贈艾儒略的這首詩，但詩句卻有不少差異。《閩中諸公贈詩》中沒有題寫詩名，而《秋室編》則列詩名為“贈艾思及泰西人”。其詩如下：

客從泰西來，云歷五春夏。
地說盡於茲，河漢已倒瀉。
其國敦敬天，衣冠佩王化。
艾君早慕道，遐荒著聲價。
若置碣石宮，談鋒倍驚訝。
利公乃齊名，腹笥何蘊藉。
遺我幾千言，讀之手常把。
始知滄海外，日月異晝夜。
神山信可登，弱水本堪跨。
乘彼貫月槎，卻是尋常者。⁽²¹⁾

比較二詩可知，儘管詩文大體一致，但也有一些細節性的差異。例如，首句在《閩中諸公贈詩》本中寫作“客從遠方來”，而《秋室編》則是“客從泰西來”，一用“遠方”，一用“泰西”。第四句《贈詩》本為“艾君早慕道，每每著聲價”，而《秋室編》則是“艾君早慕道，遐荒著聲價”。第七、八句《贈詩》本為“遺以數千言，讀之手常把。始知滄溟外，日月異晝夜”。而《秋室編》則是“遺我幾千言，讀之手常把。始知滄海外，日月異晝夜”。第九、十句《贈詩》本為“神仙信可登，弱水本堪跨。泛海昔張騫，卻是尋常者”，而《秋室編》則是“神山信可登，弱水本堪跨。乘彼貫月槎，却是尋常者”。此處《秋室編》以“神山”對“弱水”，要比《贈詩》本“神仙”與“弱水”顯得對仗工整。據筆者推斷，《秋室編》中的這首贈艾儒略詩可能是詩人的定稿，而《贈詩》本收錄的則可能是詩人最初的詩稿或者是抄稿。

在《秋室編》卷之七〈五言絕句〉中還錄有一首陳鴻所作與艾儒略有關係的詩〈題萬國全圖扇面〉：

紈扇雖細微，中圖萬國境。
絕勝月一輪，照遍山河影。⁽²²⁾

我們知道，艾儒略1623年在杭州時曾經將利瑪竇的〈萬國全圖〉重新繪製出版。陳鴻詩中提到的〈萬國全圖〉即應是艾氏携入閩中的杭刻版。有意思的是，從陳鴻詩中可知，當時的閩中士子還曾將這幅〈萬國全圖〉製成扇面，在文人圈中引起一定的反響。這首詩，不僅為研究明末福州詩文界與艾儒略的交遊提供了新的資料，而且也有助於從物質文化角度考察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

邵捷春〈贈大西艾思及〉詩

邵捷春(?-1641)，字肇復，福建侯官人。萬曆四十七年(1619)進士，累官稽勳郎中，崇禎二年(1629)出任四川右參政，分守川南，積功遷浙江按察使。後以大計坐貶，復起任四川副使，於崇禎十年(1637)秋抵成都。崇禎十二年(1639)，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以圍剿張獻忠、羅汝才失敗，被逮下獄，在獄中自殺。所著有《劍津集》。⁽²³⁾在邵氏《劍津集》詩卷之二〈五言古詩〉中收有〈贈大西艾思及〉一詩，全詩如下：

粵在義皇世，華夷共龐淳。
叔季參情僞，往往失其珍。
我聞歐羅國，景教從西秦。
重譯九萬里，不復憂波臣。
艾生衍厥旨，次我東海濱。
敬天破群說，頗與儒術親。
波濤窮表饋，指掌窺星辰。
十篇廿五論，展也號畸人。
卻謂比丘僧，尋常論夙因。⁽²⁴⁾

很顯然，邵捷春此詩是贈給艾儒略的。由此可以推斷，他和艾儒略曾經有過交遊。從上引詩可

知，他從艾儒略那裡得知了歐洲的一些地理知識，並且也對艾氏傳播的天主教有了一些瞭解。尤其是，詩中提到艾氏來到福建後，其說教“敬天破群說，頗與儒術親”，這一句形象地說明了艾儒略在明末福建採取的比附儒家傳教策略。末句“卻謂比丘僧，尋常論夙因”則反映了艾儒略繼承利瑪竇倡導的辟佛策略，在傳教過程中，不忘批評佛教。此外，詩中還提到邵捷春從艾儒略那裡獲知《畸人十篇》、《二十五言》等西學書籍。

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邵捷春是何時與艾儒略相識並贈詩對方呢？1627年，艾儒略在福州撰有一部著作《靈性篇》(又名《性靈篇》)，邵捷春曾為該書撰寫了一篇序文。⁽²⁵⁾在序文開首，邵捷春闡述了其對於天儒相通的認識，接着盛贊了艾儒略在溝通中西文化方面的貢獻：

(……)在神宗皇帝時，有利君者，自泰西來，著書數篇。大概言繕修之方，與吾儒不相遠，亦足發明斯道之同然矣。及利君往，而又有艾君者，衍其說而行之，如《靈性》諸篇，則格物之遺意也。吾儒之所格者，散見之物也。艾君之所格者，藏身之物也。吾儒云：有物有則，民秉之彝也，故好是懿德。艾君能獨標己見，而於知覺運動之所以然者，深究而詳明之，精神形氣，了無遺論，比告子言性，似有所印而差微焉。發利君之所未發，亦可謂高明知道理者矣。華夷一體，中外一心，斯不足證乎！艾君恐其言之無徵，不憚數萬里以取符於中國，而中國信其然。使中國人有操物則之說，以取符於泰西，而泰西人有疑之者邪？惜乎華人之不若夷人之堅於遠遊也，雖然得一艾君可以信其餘矣，亦不必勤吾舟航而之矣。天生利艾，其以彰宇宙道同之旨乎？微是，則鮮不謂雕題鑿齒之外，若草木之與我不同類也。夫不知人一心一理一者，則可以聘二君之奇知其一者，固亦中國之習聞習見焉已，何嫌其不相通與？君異日西還，亟以華人之道語其未至



於華者，使知吾孔氏浮海居夷之意，則君又吾儒之置郵也，豈不補哉！⁽²⁶⁾

我們知道，從1626年夏至1629年冬，艾儒略長住福州，並且與福州士大夫廣泛交遊，由此可以推斷，邵捷春應該是在1626-1627年間結識了艾儒略，並為對方贈詩作序。與前述陳鴻一樣，邵捷春與艾儒略二人之間的交往，也離不開明末福州詩壇這個平臺。邵捷春本人也是明末福州很活躍的詩人，他與徐火勃、曹學佺交好，《劍津集》中就存有曹學佺和徐火勃的序文，內中披露了邵捷春的詩才和他們之間的情誼。如徐火勃的序寫道：

予友邵肇復先生以易起家，少年聯第進士，由大行銓曹晉西蜀參藩、兩浙觀察。軒輅所至，或故都古蹟，必憑弔悲歌。乞假林居，或宴客開尊，必分題角韻。蓋自釋褐以來，吟草不下千首。⁽²⁷⁾

聯繫到徐火勃、曹學佺這兩位明末福州詩壇領袖與艾儒略的交往，我們完全有理由推斷，邵捷春也是通過明末福州詩社的活動而認識了艾儒略的。邵捷春的這首詩並不見於《閩中諸公贈詩》，它無疑為我們考證艾儒略與明末福建士大夫交往提供了新的史料。

【註】

- (1)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河北獻縣天主堂，1937年，頁202。
- (2)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34。
- (3) 林金水：〈艾儒略與福建士大夫交遊表〉，《中外關係史論叢》(5)，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184-202。關於艾儒略入華傳教活動，近年來梅歐金(Eugenio Menegon)、潘鳳娟、許理和(Erik Zürcher)、杜鼎克(Ad Dudink)、宋剛、肖清和等中外學者已經相繼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此處不贅述。
- (4) 李嗣玄、李九功、沈從先：〈西海艾先生行略〉，載鐘鳴旦、杜鼎克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利氏學社，2002年，第12冊，頁249。

- (5) 翁吉燭：《石佛洞樞儀小品》卷四〈題泰西艾先生弟子卷〉，頁23。崇禎六年(1633)刻本。
- (6) (乾隆)《永春州志》卷之二十一〈選舉·貢生〉，頁14。乾隆五十二年(1787)刊本。
- (7) 李九功：《勵修一鑒》(下)，頁24。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本。
- (8) 引自 Albert Chan, "The Scientific Writings of Giulio Aleni and Their Context", note 31, in Tiziana Lippiello and Roman Malek, eds., *Scholar from the West: Giulio Aleni S. J. (1582-1649)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1997, p. 470.
- (9) 《口鐸日抄》卷三，頁4。上海慈母堂1872年刊本。
- (10) 《口鐸日抄》，卷三，頁5。
- (11) 《口鐸日抄》，卷五，頁7-9。
- (12) (意) 利瑪竇著，P. Antonio Sergianni 編、芸琪譯：《利瑪竇中國書札》，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頁150。
- (13) 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士大夫交遊一覽表〉，載林金水著：《利瑪竇與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286-316。
- (14) (乾隆)《永春州志》卷之二十一〈選舉·明進士〉，頁2。乾隆五十二年(1787)刊本。
- (15) 劉獻廷：《廣陽雜記選》，〈附錄四：談往一則〉，《臺灣文獻叢刊》第8輯，第219種，頁79。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
- (16) (同治)《蘇州府志》卷五十四〈職官〉，光緒九年刊本。(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四〈職官〉。
- (17) 引自林金水著：《利瑪竇與中國》，頁130-131。
- (18) 陳鴻：《秋室編》卷首〈徐序〉，頁3。順治七年(1650)刊本。
- (19) 引自林金水：〈艾儒略與明末福州社會〉，《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2期，頁61。
- (20) 〈熙朝崇正集〉，晉江天學堂輯，見吳相湘主編：《天主教東傳文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頁687。
- (21) 陳鴻：《秋室編》卷之二，頁11-12。順治七年(1650)刊本。
- (22) 陳鴻：《秋室編》卷之七，頁7。
- (23)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標點本，卷260，頁6746-6748。
- (24) 邵捷春：《劍津集》詩卷之二，頁2-3。明刊本，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78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
- (25) 見 Ad Dudink & Nicolas Standaert, *Chinese Christian Texts Database (CCT-Database)* <http://www.arts.kuleuven.be/sinology/cct>.
- (26) 邵捷春：〈靈性篇序〉，載《天學集解》，頁45-46。筆者特別感謝比利時魯汶大學杜鼎克(Ad Dudink)博士慷慨惠贈此序文。關於《天學集解》，見Ad Dudink, "The Rediscovery of a Seventeenth-Century Collec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 Texts: The Manuscript Tianxue Jijie",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15 (1993), pp. 1-26.
- (27) 邵捷春：《劍津集》卷首〈徐序〉，頁3。